

“钟山山势如龙蟠 孝陵松柏何丸丸” ——明清文人笔下的明孝陵

*Ming Dynasty Xiaoling Mausoleum in the Writing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Scholars*

林盼

Lin Pan

内容提要:

坐落在南京市郊紫金山南面的明孝陵，自从14世纪末建成之后，明清两代许多文人都曾来到陵园进行拜祭，也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宫廷文人出于政治目的，对明孝陵极尽歌颂阿谀；而民间文人则或来哭陵，或来品人，或来吊古，或来赏景，由此创作了诸多丰富多彩的作品。而这些诗文，也提升了明孝陵的文化内涵，使得明孝陵从清代中后期之后，逐渐成为了南京新的文化地标。

关键词:

明孝陵 诗文 宫廷文学 民间文人

ABSTRACT:

Xiaoling Mausoleum, located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Zijin Shan in the suburbs of Nanjing, was the object of pilgrimage of many write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ver since the tomb was first constructed at the end of the 14th century, and they left behind a large body of fine poetry and prose on the subject. For political reasons, court writers were obliged to write excessive eulogies of Xiaoling, but other writers either denigrated the mausoleum or used it in their evaluation of character, threnodies for the past or appreciations of scenery, thereby enriching their writings. These writings all served to elevate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Xiaoling so that from the mid-late Qing Dynasty onwards it became a new cultural symbol of Nanjing.

KEY WORDS:

Ming Xiaoling; poetry and prose; palace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面独龙阜玩珠峰下的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自洪武十六年（1383）享殿建成以来，明孝陵已历经六百余年的风风雨雨。由于明孝陵所具有的皇家陵园性质，明代来往拜祭的人群以当朝官员为主，尤其是那些高品秩官僚的加入，使得明代的明孝陵诗歌弥漫着一股宫廷文学的气氛；而进入清代，随着南京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清廷对前朝话题的忌讳，除了在康乾二帝南巡时有官员陪同祭陵，并恭和御制诗之外，很少有朝廷重要官员将明孝陵作为诗词的写作题材。而对孝陵管理的松弛，使得大量民间文人得以有机会走近陵园，拜祭吊古，明孝陵也在这些诗人的描绘之下，逐渐褪去了其所带有的政治光环，文化内涵逐步体现出来。本文从明清两代诗人有关明孝陵的诗文出发，追索明孝陵在明清诗人笔下所呈现出的不同情状。

（一）明孝陵与明清宫廷文学

在民国学者王焕镛编著的《明孝陵志》“艺文”一章中，收录的明代诗人有关明孝陵的诗作有二十余首，诗歌数量仅占该书所收入的全部诗作的六分之一。如果详加考证这些诗歌作者背景的话，会发现其中大多数是在北京朝中或是在留都南京做官的重要官员。《明孝陵志》当然并没有收全所有的明代明孝陵诗作，但是即使算上后人所增补的孝陵诗词，其中大量出现的仍然是具有一定品秩的官员的作品。由于写作者身份的因素，决定了明代的明孝陵诗歌中，宫廷文学的因素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从诗歌的写作手法与思想内涵中可以表现出来。

所谓宫廷文学，是指由皇帝及生活在宫廷的王公、高级官僚等人相互酬唱、应制奉和所形成的文

学样式。这种文式，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三种文学体裁中的“雅”，“雅”是西周中期和晚期宫廷的乐歌，主要创作者是宫廷中的士大夫。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有一批宫廷文人聚集在统治者周围，由于内在的文学需求与外在的文化氛围影响，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流派。这些宫廷文人往往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他们仕途通达，身居高位，因此创作上讲求形式上的雍容平易，格律上的准确典雅，内容上的华彩绮丽，主要以与皇帝的互相唱和、描绘国家祭典及描写宫廷生活为写作题材。

明代初期出现的“台阁体”诗风就是宫廷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文体的开创者是永乐、洪熙、宣德和正统年间的台阁重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人身居高位，处境优裕；而当时国力整体较为强盛，“海内晏安，民物康阜”¹；且他们又是洪宣盛世的直接参与者，与帝王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这些条件使得台阁重臣们对于国家气象与生活状态十分满意，由此产生出了颂德阿谀与美化生活的创作倾向，“台阁体”的诗风便由此而生。除了“三杨”之外，胡广、夏原吉和金幼孜等永宣时期的重臣，也由于相似的原因，而投入到宫廷文学的创作之中。

“台阁体”诗人群体位高权重，把持朝政多年，在朝野都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且明代一直到正德朝之前，虽有土木之变的危机，但基本保持着较为太平的景象，社会也比较稳定，这使得“台阁体”之风在明代前期统治了诗坛七十余年，“非独职词翰、官馆阁者为然，凡布列中外厘政务、理兵刑者，莫不皆然”²。正德朝的茶陵派首领李东阳尽管对“台阁体”内容的乏味、作风的趋附与模仿等诗风不满，力图以比兴寄托的诗歌传统方法与雄健浑朴的风格挽回台阁体的颓废趋势，但是由于李东阳“立朝五十年”，日常生活也

1 杨荣：《杏园雅集图后序》，《文敏集》卷十四。

2 丘浚：《云庵集序》，《琼台会稿》卷九。

不脱“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李东阳《费司业廷言留饮题壁》）的优裕状态，使得茶陵派对“台阁体”诗风的改变只能是一种改良。虽然在嘉靖朝之后，“台阁体”式的宫廷文学受到了以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等诗人的攻击，但在两京做官的高级官僚仍然服膺此道。

以“台阁体”为代表的宫廷文学，追求内容上的雍容典雅与辞藻华美，缺乏内在情感的切入与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尤其是创作题材上带有政治色彩的诗歌，如国家仪式、拜祭皇陵时，总会尝试将自己的情感遮掩起来，熟练地运用各种抒情手法来歌功颂德，目的是为了通过诗歌来表现“理性情而约诸正，而推之可以考见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¹。而以皇家陵园明孝陵作为写作题材，正可以表现出这些宫廷诗人的创作理念。这些诗人创作的明孝陵诗歌，充斥着大量的铺张奢靡之语，讲究对仗排比，着力渲染明孝陵的壮观雄伟、明太祖的丰功伟业，同时为当代帝王歌颂功业并表达自我的报恩心态。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李东阳的《重谒孝陵有述》：

龙虎诸山会，车书万国同。星躔环斗极，
王气绕江东。

地涌神官出，桥分御水通。丹炉晨隐雾，
石马夜嘶风。

日月无私照，乾坤仰圣功。十年瞻望地，
云树郁葱葱。

诗歌用“龙虎”、“万国”、“王气”、“神官”、“日月”、“乾坤”和“圣功”等绮丽词汇，对明孝陵进行了极尽奢华的描写，同时赞颂了明太祖朱元璋开创明朝的辉煌事业。这样满篇浓墨重彩的铺张描绘，而缺乏个人情感的流露，借用胡应麟对“前七子”领袖李梦阳诗歌

的评语：“人但见黄金、紫气、青山、万里，则以于鳞体”，因此“不耐多读”²。类似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描绘，也同样出现在程敏政的《谒孝陵恭赋》、严嵩的《谒孝陵》、张如兰的《恭谒孝陵》、于慎行的《恭谒孝陵有述十四韵》和范景文的《恭谒孝陵》等诗歌中。

弥漫在两京高级官员之中浓烈的“台阁体”文学风潮，一直在明代诗坛中盛行。即使到了明代末期，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起义风潮，而在这些身为朝廷重臣的诗人笔下，明孝陵仍如同一座漂浮在空中的凌霄宝殿。当诗人们走进孝陵寝园的时候，就如同统一了口径一般，高唱开国皇帝的伟业远迈前朝，所谓“开辟三王后，陵原一代思”（高出《恭谒孝陵》）；盛赞寝园建筑是如此壮观气魄，所谓“霞标悬绛阙，云际拱雕梁”（于慎行《恭谒孝陵有述十四韵》）；描绘着“松楸悬日月，江汉洒钟虞”（刘宗周《恭谒孝陵有述》）、“茏葱佳气五云连，解阜冰弦万壑传”（郑鄮《孝陵恭纪》）的景象，其中能看到的一丝与时局联系起来的内容，顶多是“龙蟠终待起，一箭殒狼星”（陆宝《孝陵》），期待高皇帝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后人守住这得来不易的江山，其他的词句还是一如既往的远远地疏离俗世。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朝廷官员只会写作这些歌功阿谀的诗句，许多诗人尤其是刘宗周、郑鄮等，写过很多忧国忧民、反映世道人心的诗歌。造成明代宫廷诗人创作明孝陵诗歌时口径一致地进行歌颂与赞美的状况，除了因长期浸淫在相对封闭的官方政治文化的环境之中，而造成的诗歌内容贫乏与思想苍白的毛病之外，明孝陵这座建筑所承担的强烈的政治意义，也是这些诗人无法放开手脚进行创作的重要原因。在面对先皇的坟墓和遗物时，诗人们很难能自由地抒发内心的情感。阅读这些拜谒孝陵的诗作，明显地感觉

1 杨士奇：《玉雪斋诗集序》，《东里文集》卷五。

2 胡应麟：《诗薮》续编二《国朝下·正德嘉靖》。

到一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墓中人”的情感。这种情绪使得诗人们尽可能规避掉那些敏感和刺眼的词汇，内容也尽量平和甚至不惜平庸，往往起首就往“紫气”、“神灵”和“万岁”等字眼上靠，或者将创作这一类的诗歌，作为表现臣下内心忠诚与对君主感恩戴德的方式，如刘昌在《谒孝陵》诗中描述的“清平一曲今遭遇，惭愧春晕未报恩”；刘宗周《恭谒孝陵有述》中所提到的“小臣衔命至，何以效微躯”，恭敬、景仰的情绪成为了思想的主导。

进入清代，由于满族皇帝对于汉文化的爱好，在康熙、乾隆等皇帝的周围，同样聚集了一批宫廷文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与历代“前辈”相似，或者以政治活动与仪式为写作对象，或者将日常生活与寻常事物披上一层政治的外衣。然而在清代的明孝陵诗文中，宫廷文人的痕迹却远比前代文人来得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清代南京由留都降格为省会，其政治中心的地位也一去不复返。清政府不会再像前代那样，“每岁圣旦、正旦、孟冬、两忌辰酒果行香，清明、中元、冬至太牢致祭”¹，进行所谓“五小祭、三大祭”了，也不会要求在南京任官或来往南京的官员必须前往明孝陵进行拜祭。由于南京逐渐远离政治中心，使得在清代描写明孝陵的诗人中，朝廷官员的数量大幅下降，导致词藻华丽、内容贫乏的宫廷文学不再是明孝陵诗词的主力军。且作为胜代的政府官员拜谒前代皇帝的陵园，在政治上多少会有一些忌讳，尤其是在文字狱大行其道的情势下，连一句“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都会被扣上“反清复明”的帽子，那些在任的官员更不敢轻易留下描写明孝陵的诗句了，如历代两江总督的文集中，就几乎没有出现过描写距离他们官府仅几里之遥的明孝陵的诗文。

清代宫廷文人创作明孝陵诗词，集中在康乾两代



〔图一〕南京明孝陵神道及石兽

帝王南巡时期，且由于康乾二帝直接参与到了写作明孝陵诗歌的活动中，对明朝的历史地位与明孝陵的存在价值作了政治上的认定，让那些“恭和御制谒明太祖陵”的诗人也只能根据皇帝的旨意，亦步亦趋地进行创作。如果品读那些恭和陪祀明孝陵的诗歌，那种弥漫在明代宫廷中的“台阁体”风味又会扑面而来，如“共欣典礼超千禩，覆载无私颂几回”（高士奇《陪祀明太祖陵恭纪》）、“皇情思往代，旷典逮前王。封树生春色，山川贲宠光。云霞扶御辇，日月拥垂裳”（陈廷敬《圣驾展礼明太祖孝陵恭纪》）、“每度亲劳御辇过，普天同仰圣恩优。松楸烟路衣冠夜，犹感皇家雨露稠”（汪士鋐《幸明太祖陵》）。只有在皇帝南巡谒陵的时候，明孝陵才重新回到了宫廷文人的创作视野之中。

从写作手法和诗歌质量上看，明清两代宫廷文人笔下的明孝陵诗词是一脉相承的，这主要是由宫廷文人的创作风格、明孝陵的政治意义等特性而决定的。由于明孝陵在明代皇家陵园中的性质，有幸进入明孝陵拜谒的大多数是朝廷的官员，而一般的民间文人很难有机会进入陵园，这使得明代的民间文人很难加入到明孝陵诗文的创作行列中来，宫廷文人成为明代明

1 万历《大明会典》卷九十，礼部四十八《陵坟等祀·陵寝》。

孝陵诗歌创作的主流群体。而清代,随着对明孝陵管理的逐渐松弛,越来越多的民间文人有机会走进陵园,抚古思今,抒发内心情感,由此清代的明孝陵诗文显得丰富多彩,明孝陵的文化内涵也在这些文人的描绘与感叹之中,逐渐凸显了出来。

(二) 民间文人与明孝陵诗文创作

如上所述,由于明孝陵在明代所具有的重大的政治意义,不仅限制了进入陵园的人群的身份,同样也使文人在创作中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无法畅所欲言。这样的局限在民间文人的创作之中也有所体现,如明末学者谈迁的《孝陵》诗中,“真龙五采竟深藏,暗吐人间日月光。册府何时探禹穴,精灵随处耀星芒”,所用的口吻与宫廷文人如出一辙。

而如果淡化明孝陵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同时挣脱“台阁体”宫廷诗风的限制,敢于表现自身的情感,那么创作出一首内容丰富、声情并茂的明孝陵诗作,也并非难事,明代中期的诗人徐渭就是例证,他的名作《恭谒孝陵正韵》全诗如下:

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疲
驴狭路愁官长,破帽青衫拜孝陵。

亭长一杯终马上,桥山万岁始龙迎,当
时事业难身遇,凭仗中官说与听。

诗中徐渭用了“白头落魄”、“疲驴狭路”和“破帽青衫”等词语,写尽了自身的凄惨遭遇,然而他将这样的遭遇与明太祖的开国事业并列,就鲜明地表现出他内心的自负与不甘现状的情感,尤其是一句“当时事业难身遇,凭仗中官说与听”,给人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的气概。而这种情感又反衬出了自身的困窘状态,由此将诗人心中悲痛与无奈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最成功的一点便在于将明太祖请下神坛,将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平等

地对话,同时将自身的情感融入诗作之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然而这样的诗歌,在明代寥寥无几,由此更显示出这首诗的艺术价值。

而在清代,明孝陵的政治意义逐渐消散,随着岁月的流逝,文化内涵逐渐积淀,再加上民间文人的投入创作,使得明孝陵成为清代诗歌的重要题材,《明孝陵志》中所收入的清代明孝陵诗词有130余首,而算上那些未收入的拜谒孝陵或者描绘孝陵景物的诗歌,数量大约接近400首。不仅诗歌数量众多,而且佳作名句也不胜枚举。从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哭陵”、“品人”、“吊古”和“赏景”四类。

一、哭陵。由于明孝陵所背负的鲜明的政治意义,清朝初年的遗民诗人往往将明孝陵作为缅怀故国的场所。诗人们虚写陵园的景物风貌,重点则是在诗歌中宣泄着他们对于亡国的痛苦心境。如“每过陵宫一下车”(《侨居神烈山下》)的顾炎武,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多次拜谒孝陵,每次拜谒都作诗,每一首都感人肺腑,表达了他对故国的怀念和哀思,如“瞻拜魂犹惕,低徊思转哀”(《再谒孝陵》)、“薄海哀思结,遗臣涕泪稠。礼应求草野,心可对玄幽”(《闰五月十日恭诣孝陵》)等。同样身处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徐州二遗民”之一的阎尔梅,在他的《谒钟山孝陵》的诗作中,也充满悲愤地写道:“石像摧残缀野藤,鹿狐蛇蟒迹崢嶸。樵夫见我徘徊久,放担前来痛不胜。”“咄咄江山一旦崩,朝天宫穴亦难凭。孤臣二十余年泪,忍到今秋洒孝陵。”这些诗歌充分表达了身经日月更迭的前朝遗臣内心的苦痛,情感流露之真挚令后人亦不禁潸然泪下。

这样的痛苦情感,长期弥漫在清初遗民创作的诗文之中。如屈大均在明亡的时候不过14岁光景,国仇家恨对于他来说,远没有前两位那样的切身感触。而当他北游入南京谒明孝陵之时,已经是顺治十三年(1656)以后的事了,但是这种遗民情感,依旧在他的

笔触下回荡。在《孝陵恭谒记》中，他写道：“臣大均自至陪京，尝三谒孝陵，以及东陵，匍匐阶墀，与二三宫监相向而哭。”当那些“牧马蕃儿”摧残孝陵享殿的金龙鳞爪之时，屈大均“拜之而求免”，然后悲恸地感叹道：“呜呼！尚忍言哉！亦尚忍而不言哉！”¹这样的心境，在他的名作《旧京感怀》中也有深刻体现：“江南哀后无词赋，塞北归来有羽翰。形势只余抔土在，钟山何必更龙蟠。”正是明孝陵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得这些遗民在拜谒孝陵之时，勾起了他们对先皇和故国的缅怀。应该说，这时的明孝陵承继了过往岁月所附加的政治光环，但是又由于国破家亡的现实，使得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加入了个人的悲恸情感，使得这一时期的明孝陵诗文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末世情怀。一直到这批遗民或改变信仰服务清廷，或逐渐年迈淡出时代，这样的血泪诗文才逐步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二、品人。由于距离明朝开国的时代逐渐遥远，清人不再如明人那样，将明太祖视为高高在上的政治偶像。因此不少清代诗人在描绘明孝陵时，不再简单空洞地描绘煌煌贵气，而是藉由孝陵这一媒介，较为客观地评述明太祖的功过得失。这些诗歌集中描写明太祖驱逐蒙元开创明朝的伟业和胡蓝案的残酷暴虐，并且将后来的靖难之役，归结为明太祖的立储失误。比如汪士铎的《孝陵》，从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殊业，写到太祖立储失误招致靖难，再写到大明江山颠覆，崇祯皇帝死难，随后将笔墨转回到“藓碧丰碑矗，山青石兽蹲”的孝陵景象，这种指点江山三百年的气势，堪称这一类诗歌的典型。而钱大昕的《过明孝陵》，则是以史家之笔，寥寥百字勾勒出了明太祖的一生伟略，如同一篇简明扼要的明太祖本纪。其他像袁枚的《孝陵十八韵》、杨绳武《游钟山拜孝陵》、许正綬的《孝

陵》都具有类似的风格。

更多的诗歌，则是在议论明太祖的同时，又通过明太祖这个历史人物，尝试着对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进行评点。而对于前朝，清廷早已有了官方的定论，那就是康熙帝南巡拜祭明孝陵时手书的“治隆唐宋”碑。如此高的评价，使得之后有不少诗人在拜谒明孝陵的时候，就将这段评价写入诗歌。如卓尔堪《谒神烈山陵》“贞珉卓立镂奎章，至德真堪迈宋唐”，毕沅《孝陵咏古四首》“定鼎功资褒鄂辈，开基治轶宋唐前”，陈作霖《春日出朝阳门登钟山憩三茅宫下寻紫霞洞饭上清道院过明孝陵归道访半山寺陟谢公墩得四首》“谓治隆唐宋，翠华亦亲临”。而且，由于这样高的评价是来源于胜朝的圣祖皇帝，让清代的诗人在评点前朝的时候，会将题名勒石的事迹也写进诗内。如杨绳武的《游钟山拜孝陵》就浓墨重彩地写道：“欣逢圣代厚前朝，典礼优崇禁蹂躪。犹忆先皇驻蹕年，九重亲自拜几筵。扫除寝殿添陵户，封植松楸广墓田。御笔亲题迈唐宋，丝纶昭揭日星悬。”袁枚也在《孝陵十八韵》中夸赞康熙帝的这一举动：“昭代宽仁极，前朝典礼隆。守园颁内监，留像护重瞳。”其他像陈鹏年“今王崇礼事非常，榱桷重新俎豆香”（《再谒明陵》）、周廷谒“嘉叹九重躬酌酒，一抔细草亦沾恩（诗人自注：今上两幸孝陵，行九叩礼，且令重葺，书“治隆唐宋”四字勒石）”（《谒孝陵·戊子》）都一再地重复这一事迹。在他们看来，清朝皇帝对作为朱明王朝象征的明孝陵优渥宽待，充分表现了本朝统治者的非凡气度。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到，康熙帝亲谒明孝陵，高度评价前朝皇帝，对于争取到知识分子与前朝遗民的支持，确实具有不同一般的效果。

三、吊古。对于明朝人来说，明孝陵只能算是一座新建筑。与南京那些兴毁无常，时存时亡的古迹相

1 屈大均：《孝陵恭谒记》，《翁山文外》卷一。



〔图二〕康熙皇帝手书“治隆唐宋”碑



〔图三〕明孝陵东配殿碑墩遗址

比，一直保存较为完好的明孝陵，显得缺乏文人墨客创作诗歌所必需的传奇色彩，除了从明孝陵联想起明太祖之外，就只能在王气之类的话题上做文章了。

而在明清交替之际，明政府忙于解决内忧外患，清朝则忙于东征西讨南明的抵抗势力，占领南京后对明孝陵并未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加上孝陵毕竟历经三百年风雨，不可避免地出现老化、毁损，使得整个陵园在清代初期呈现出了萧条荒芜的景象。虽然在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谒明孝陵，并命灵谷寺僧修理¹，但是在南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永历帝询问“潜视孝陵”的宦官李国辅明孝陵状况如何，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殿垣陵螯毁坏无余。茅茨塞望，狐啸蜚吟，如荒山穷涧”²。由于监户散亡，守卫无主，孝陵“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皆为刀斫伤，或折树木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牧羊马、种蔬圃者交迹于殿外……朝门内外所镂石，为黄门内侍、将军、狮象牛马之属，或直立，或颠仆，折落于污泥之中”³，一派“牧牛俯砺台碑角，石马横眠蔓草丛”（刘芳荫《明孝陵道上》）的情势。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南巡的时候，所见到的明孝陵景象仍是“墙垣倾圮，

林木凋残”⁴。

从昔日的绝代光华到今日的荆棘丛生，原先只是存在于旧籍中的“朝代更迭、国故鼎革”的局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如此触目惊心。因此清代的诗人大量地将孝陵的衰败景象作为题材，如汪铤的“铜驼生棘埋钟阜，铁戟沉沙洗石头”（《友人自金陵还》）、凌天杓的“满地羊牛欺石马，五更风雨泣铜驼”（《游孝陵》）、何槩的“铜驼雨泣炊烟垂，石马风嘶牧笛残”（《入金陵两首》）、章静宜的“草满故陵埋石马，月明荒径泣铜驼”（《金陵》）、孔尚任的“宝城石坏狐巢大，龙座金消蝠粪多”（《游明孝陵》）等，皆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表现他们对历史风云变幻、兴衰成败的感念，由此赋予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母题“金陵怀古”以新的素材和内涵。如郑板桥的十二首组词《念奴娇·金陵怀古》中，将孝陵作为一“古”进行缅怀，写到了“翁仲衣冠，狮麟头角，静锁苔痕绿。斜阳断碣，几人系马而读”。利用刚刚故去的明代历史作为写作素材，使得这一母题更具有时代感，更能触动读者的心弦，也更让人身临其境地理解了何谓“自古盛衰如转烛，六朝兴废同棋局”（劳之辨《眺

1 陈文述：《金陵通纪》卷一。

2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五《宦者列传·李国辅》。

3 魏世倣：《孝陵恭谒记》，《魏昭士文集》卷六。

4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十七，康熙二十三年十月。



〔图四〕明孝陵外郭城正门——大金门遗址



〔图五〕晚清改建后的明孝陵陵门

玄武湖歌》)。

四、赏景。明朝的民间诗人，基本上连孝陵的门都进不去，即使得以拜谒孝陵，也往往由于每次拜谒孝陵的人数太多，所谓“千官瞻拜后，花露湿峨冠”（张如兰《恭谒孝陵》）、“俯仰千官祝，蒸尝万祀需”（刘宗周《恭谒孝陵有述》），而无法以比较轻松平静的心态自由地观赏陵园景色。面对着如此壮观的拜谒景象，就如同七月半的西湖之畔，文人们一无可看，只可对着雕梁画栋发发感慨，感受一下漫山遍野的腾腾雾气¹，回顾一下昔日高皇帝的飒爽英姿。这样的拜谒过程使得这些诗作很难写出个人的心境和特色。

而在清代，虽然清初多铎也“遣内官正副二员，陵户四十名，守明陵”²。但这些陵户的职责，不过是不允许在孝陵内伐木和放牧，并没有严格禁止外人进入，因此清代文人进入孝陵相对要方便得多。这些诗人或专程前来拜谒孝陵，如王路清《孝陵》、杨绳武《游钟山拜孝陵》；或者在灵谷寺和孝陵之间穿行，如朱卉《由灵谷寺经孝陵》、陈作霖《八月二十七日秦任虞招饮宝公禅院，是晨与朱子期先游孝陵循山径

而至灵谷，赋示同集诸君》；或者在钟山周围信步而行，如胡光炜《二月十五日同确臬白甸太平门明孝陵看花还饮市楼》、陈作霖《九日经驻防城寻明故宫小憩半山寺遂出朝阳门观孝陵欲往灵谷寺未果绕自西华门入登鸡鸣山绝顶而归得诗五首》。在清代中期之后，明孝陵日渐和秦淮河、莫愁湖、雨花台那样，成为南京的一个固定的旅游景点。或三五知己，或单身独行的放松心态，也使得这些诗人不至于像明代那些专程拜谒孝陵的官员那样，多达千人聚于一时，匆匆而来走马观花，而是在一个人烟相对稀少的情境下³，较为轻松地信马由缰，观赏着昔日巍峨宏伟的帝王陵墓的景致风情，如朱应昌的《孝陵行》、黄模的《孝陵览古同马雨耕（春田）陈秋崖（斯来）敏园（具来）》，都将孝陵内的景色全貌栩栩如生地作了描绘刻画。这种近乎白描的创作所拥有的环境，不是明代那些在黎明腾腾雾气的笼罩下匆忙之间进行拜谒的官员文人所能拥有的。

借着可较为自由地出入明孝陵之便，清代的诗人或缅怀前朝，或访胜吊古，或纯粹赏玩风景，创作了

¹ “行礼以黎明为期，如有不到及失仪者，听赞礼官纠举，呈报本部，季终，类参罚治。”见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一七，礼部七十五《南京礼部·仪制清吏司》。

² 陈文述：《金陵通纪》卷一。

³ 如邵长蘅：《望钟山》：“怅望寝园今寂寞，牧人秋卧孝陵烟。”彭蕴章：《明孝陵》：“松柏园林锁寂寥，游人下马说前朝。”程颂万：《孝陵》：“夕阳陵户两三家，江表年年望翠华。玉座苔荒人曝麦，金坛树冷鸟衔花。”



〔图六〕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先生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官员拜谒明孝陵

大量描写明孝陵的诗词。这些诗词或情感丰沛，或平直质朴，或高屋建瓴，或细腻白描，为清代的诗歌宝库增添了诸多名篇佳作。而明孝陵也借着这些诗作，逐步展现出其所独具的文化内涵。乌衣巷、桃叶渡及雨花台等六朝古迹在清代中后期几乎均已湮没无存，明孝陵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南京新的文化地标。

（三）余论：晚清民国文人笔下的明孝陵

由于明太祖在历史上显赫的地位，使得明孝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摆脱政治象征的地位。来往明孝陵的人，往往不是为了欣赏钟山一方水土的山清水秀，而是带着或敬仰先祖、或缅怀故国的情绪来拜谒，使得明孝陵一直被当作一个政治符号来描绘。这样的状况一直到清代中后期，随着明太祖和前明的历史影响逐渐消弭，人们开始将明孝陵当作一个赏玩游乐或者怀古伤今的场所，明孝陵的文化价值才逐渐得以显现。

在清朝末年，时局的再度巨变重新影响了明孝

陵诗文的创作，最明显的就是重又出现了明末清初的“政治符号化”倾向。如在半个世纪之间先后来到明孝陵大规模拜谒的洪秀全和孙中山，就在明太祖陵墓之前，慷慨表示：“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¹，以及高呼“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²，表达了矢志推翻清王朝的政治立场。事实上，晚清不少民族主义者拜谒明孝陵时也常常带有这样的情感。如丘逢甲在《谒明孝陵》的组诗中，就发愿“江山一统新都定”、“炎黄华胄主中原”，等到那个时候，不仅要“大纛鸣笳谒孝陵”，甚至还要“昌平再告十三陵”。而在革命军攻占南京的时候，也有人写道“出自东门频怅望，孝陵佳气未全无”（冠南《金陵杂感》），似乎明孝陵的佳气还在冥冥之中保佑了这群革命将士们。

然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类重新赋予明孝陵以政治意味的诗词，只是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而主流的诗歌内容，还是延续了清代以来明孝陵逐渐淡化政治因素、凸现文化内涵的大势。从清末到民国的明孝陵诗词，大多依然在感叹历史兴亡、赞颂明祖功业及描绘陵园景色等方面做文章。在民国时期诗人凌宴池的笔下，明孝陵依然是一副“日黯风凄喧鼓角，鸡栖牛卧乱蒿莱”（《独游明孝陵》）的荒芜景象；著名女诗人陈家庆则用一组绝句诗，来彰显明太祖昔日的丰功，同时追忆了“麻衣寒食哭冬青”的“亭林老居士”（《明陵》）；国民党元老程潜的《初春谒陵》中写道“大江如可引，群峰俨来朝。长林蔚苍翠，佳气贯斗杓。悠悠郁情抱，嚮嚮怀春膏。神灵若对越，敢惮登陟劳。”陵园所处

1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五，列传二百六十二《洪秀全传》。

2 孙中山：《祭明陵文》页95，《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

绝佳的地理位置与景色的壮美幽静，在诗中一点一滴地流露出来；而“和风拂衣裾，细草承车轂”，一派名士风范的黄侃，写出的诗句也是气度悠然，“仰瞻翠微高，苍松郁相櫨”（《谒孝陵作》），堪称民国时期描写明孝陵诗词的代表作品。

随着民国十七年（1928）在钟山东麓建起了中山陵，明孝陵所承载的政治意义彻底消散。今天的游人来往孝陵，几乎不会有人再带着缅怀前朝的心

态，而是在翁仲石象之间，碑刻墙垣之侧，方城明楼之内，感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的迷人魅力，并且在悠闲徜徉之时，品味历史的沧桑。历史的厚重和兴亡交替，就在这170公顷的方圆之中，完全地凝固起来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赵中男 项坤鹏)